



知識的跨域汲取與生產：

我的移地研究經驗[#]

楊昊*

一、前言：為什麼要進行移地研究？

對於一個從事國際與區域研究的學術從業人員來說，除了藉著長年累積的學理知識來探索國際趨勢的變與常，更重要的工作便是要即時、明確的掌握國際現勢的發展與脈動，才能如實分析世界政經態勢的最新路向。

近年來，無遠弗屆的網絡傳播與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成為國際研究者最重要的研究利器。無論是國際衝突、暴動、政變或者是跨域巨災的爆發，儘管遠在數千公里外，但只要熟悉相關資訊來源與網路平臺的研究者，須臾間即可藉著網路媒體汲取各項最新消息。待研究者消化完豐富的資訊後，藉著慣用的知識生產程序，要量產系統性的研究成果其實並不困難。在這個極為「便利」的全球化時代，我們不得不承認，只要研究者以「便宜行事」的態度不加思索的如法炮製，這將嚴重侵蝕學術與研究知識的價值。

當什麼資料都可以透過網路尋找取得，對研究者而言，遠離網路、離開象牙塔、走出研究室進行田野調查、深度訪談或者是到國外從事移地研究，都意味著需要更充裕的時間與更多的經費與資源，才能如是完成相關研究計畫。有時候，研究者並非刻意抗拒這些被視為是「高成本」的研究方法，或者拒絕採取更為精鍊的途徑來強化自我知識生產的功夫。關鍵在於研究者受

[#] 本文部分內容改寫自作者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從邊境政治到跨境政治：泰國－柬埔寨－寮國邊境區域中的跨境在地化模式比較研究〉(NSC-100-2628-H-004-138-MY3)、〈東南亞邊境政治與東協角色之研究：泰－柬領土爭端與印－馬領海爭端的比較〉(NSC-98-2410-H-004-192)等研究成果，以及作者最新出版專文，請參考：(楊昊，2013：47-63；楊昊、蘇義淵，2013：225-240)。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助理教授

到既有教學、研究、行政與服務評鑑等壓力的交錯影響，確實很容易產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困窘。

特別是對於國際與區域研究此一領域而言，單憑網路與媒體所取得的各類資料，儘管迅速且豐富，但在性質上多半只是片段資訊 (information) 的累積，無法自我轉化成有說服力的系統性知識 (knowledge)，其所生產的作品大多會淪為專有名詞的堆砌與重大事件的流水記錄，這種「失溫式」的研究很難與讀者間產生共鳴，甚為可惜。

從筆者所從事的東南亞區域研究中，很容易可以察覺「平面的資訊」與「立體的知識」之間的明顯差異。前者散見於各類重複轉載新聞紀錄或學術評論的冰冷文字堆疊中，後者則出現在為求探索真相、甚至如實為地方代言所呈現的各類熱血分析。許多從事東南亞研究的國內前輩與國際先進，即以畢生之力貫徹特定研究旨趣，便是希望能真正成就一份好的區域研究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作品中，有不少融合了移地研究的長年經驗所完成。

筆者的東南亞研究資歷甚淺，近年來主要從事區域主義 (regionalism)、邊境政治 (border politics)、柔性權力 (soft power) 的政策實踐等主題之研究。個人自求學時期便期許深耕東南亞區域研究，並以此區域為參照，試圖探索國際與區域研究的知識與方法連結。在過去幾年內，尤其感謝國科會、中央研究院與若干政府機關的支持，個人獲得了多次前往東南亞移地研究機會，得以豐富自我知識體系的累積與深化。

拙見以為，「移地研究」顧名思義指的正是走出研究室、走向社會的研究途徑，它是一種探索世界、開發知識的執行方法。所謂的移地，沒有國內與國外的地域分別，只有象牙塔內、外的態度差異。藉著「移動」而累積的所見所學，除了意在確認 (或駁斥) 研究者對於「已知」的了解，更具有探索或挖掘「未知」的意義。從過去執行研究計畫的經驗中，逐漸了解移地研究對於知識生產最為關鍵的助益，大致有二：其一，藉著移動來探索已知與未知，與現有的學理知識迸發出新的洞見 (insight)；其二，藉著「進出田野」與「走近世界」的方式，逐步淬鍊出自身的研究技藝 (craftsmanship)。

個人不揣謏陋，盼能透過此一短文分享近年來從事第二軌外交工作與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時的跨國研究實作，具體呈現移地觀察與跨國探索對於國際與區域研究的重要性。在此亦希望拙文能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在方法論上的思辯與共鳴。



二、我的第二軌外交實作：國際關係學者的「田野」

從事區域研究的學術社群特別重視田野工作對於成就一份「好的」區域研究的關鍵意義，不過，究竟什麼叫做田野經驗？這是不是意味著研究者一定得前往山野、或者下田耕耘，才能稱之為「從事」田野？又或者，執行田野調查是不是一定得進行數週、數月、甚至數年，經年累月的深耕才能醞釀出有用的經驗？的確，這些問題時常困惑著想要投入國際研究的後進學子。

筆者服務於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後簡稱國關中心），該單位在冷戰時期曾扮演政府政策智庫的角色，長期為中華民國政府提供大陸與國際戰略的對策諮詢。從 1950 年代迄今，國關中心培育了極其豐富的國際研究人才，儘管冷戰業已結束，但我國政府仍重視國關中心在大陸政策、外交政策與國防政策上的建言角色。國關中心迄今仍接受政府各部會的委託與補助，辦理許多重要的雙邊對話論壇與國際會議，持續扮演著第二軌外交的工作平臺與網絡軸心。中心研究同仁除了得投入教學研究工作，更需發揮學術外交社群的能量，積極參與對亞洲、美國、歐洲、東南亞與非洲等政策論壇，同時也受邀在國際政策社群的工作會議中為臺灣發聲。

個人目前在國關中心內擔任「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SCAP Taiwan）的執行秘書，過去亦參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大陸東南亞水資源安全研究小組」（Study Group on Water Resources Security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的工作會議與相關對話系列。事實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是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附屬的第二軌外交機制，下設各種以議題為導向的研究小組（study group）。¹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透過域內智庫網絡與政府推薦，邀集各國專家學者代表不定期參與系列研究小組會議，藉著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與政策論辯的過程，逐步匯集各方意見並形構出具體的政策備忘錄（memorandum），提供給東協機制與各國政府官員研擬合作對策之用。

在過去參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大陸東南亞水資源安全研究小組」的

¹ 目前設有 4+1 個研究小組，分別是：「預防外交研究小組」（Preventive Diplomacy）、「區域安全架構研究小組」（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海域良好秩序原則研究小組」（Principle for Good Order at Sea）、「亞太地區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反擴散研究小組」（Counter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the Asia Pacific）及其分項團隊「出口管制專家小組」（Export Controls Experts Group）。

對話會議期間，深刻感受到大湄公河流域上、下游國家在面對水資源衝突時的競合關係與緊張情勢。事實上，對於參與外交政策或從事國際研究的臺灣學者而言，對於此一流域國家的敏感爭議並不陌生。儘管臺灣並非流域爭端方，但從各大國際新聞、媒體網站或專家評論中，亦可初步掌握問題癥結所在。這些二手資料的內容儘管豐富且多樣，但知識品質卻參差不齊，時而論述過於片面且武斷、時而為特定國家或團體背書，再加上許多國家級的研究單位不願釋出關鍵資訊，使得在臺灣欲進行相關研究，僅能被動取得資料進而容易陷入分析上的盲點。

再者，這類跨國研究的主題甚為複雜（主、支流極廣、衝突點散見），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研究者要逐一進行田野工作蒐集初級資料確實不容易。正因為如此，近距離參與對話、辯論的會場觀察，便成為筆者探索大湄公河流域衝突的難得管道，而這也是用以呈現流域國家（包括流域外利害關係國）之間權力政治角逐的最佳「田野」場域。

一場又一場的研究小組會議，邀集了各國水資源專家與在某種程度上獲得政府授權的學者代表參與討論。其中的每一段發言都代表著國家或特殊團體的利益，每一份資料都來自於嚴謹的科學研究（儘管立場不同，科學調查的結果也不同），而每一項回應都捍衛著被剝奪權利者的聲音。從會議主席與共同主席的安排（在某種程度上刻意迴避了上游國家），到備忘錄中的字詞斟酌（上游國家對正式文件內容的逆襲），在在呈現出國際權力政治角逐的戲碼。除了上、下游國家因為水資源失衡爭議所形成的對立關係，更有流域外大國勢力（如美國、日本與印度）因戰略布局考量加入戰局，使得不對外開放的會議室裡充滿著各國就河流使用的公平性與永續合作前景的精彩對抗與辯論。

由此經驗中，筆者深刻體驗到對於以「關係導向」為關懷的國際研究，真正的「田野」其實就在專業的國際會議與對話論壇中。儘管時間不長、儘管每次開會的地點不定、儘管與我們習慣想像的「田野經驗」有極大的出入，但這類以「短期的」、「密集的」、「浮動的」移地研究所累積而成的田野經驗，卻相當關鍵且實用。對於參與第二軌外交政策社群討論的國際研究學者來說，縱使其所彙整並提供的東南亞分析與研究，多少囿於資訊透明度之局限或受政府機構委託的政治敏感性，鮮少對學界或社會大眾公開；但相關研究者透過長期參與第二軌外交機制所醞釀及培養出的東南亞觀察與觀點，不



但更貼近國家參與區域進程的戰略利益，更能務實的、準確的將學術社群所習慣的「東南亞的想像」(Southeast Asian imagination) 轉換成具有實際利害關係的政策論述 (policy discourse) 與關切。相關論者儘管並未直接針對實際參與談判、第二軌外交對話的過程著述詳論，但卻間接透過其他研究論文與學術專論的撰寫與發表，重新展示過去投身實際政治並參與政策討論的薰習經驗。很明顯的，此種由政策社群所投入、經營的東南亞研究，其移地研究與田野經驗，長期以來的確被外界所忽視。

三、我的邊境政治研究：中南半島個案的比較

相較於參與第二軌外交對話機制的移地研究經驗，筆者在執行歷年國科會計畫〈從邊境政治到跨境政治：泰國－柬埔寨－寮國邊境區域中的跨境在地化模式比較研究〉(NSC-100-2628-H-004-138-MY3)、〈東南亞邊境政治與東協角色之研究：泰－柬領土爭端與印－馬領海爭端的比較〉(NSC-98-2410-H-004-192) 的多次移地研究過程，除了走訪泰國、寮國與柬埔寨首都進行訪問，亦深入泰－柬、泰－寮邊區，確實較類似於傳統的田野工作。

從 2009 年到 2013 年間，筆者開始從事邊境政治的研究工作。最初的研究設計乃從國際關係學理中的衝突管理 (conflict management) 著手，探索東南亞國家因為邊境領土爭端所造成的衝突情勢，並且從中理解相關區域組織與國家在處理、因應與妥協領土爭議的各種機制與作法。此種純粹探討國與國之間衝突與合作的「關係導向」研究取徑，在執行上面臨到不少挑戰，原因在於來自於首都或中央政府的資訊，顯然難以充分、如實的呈現「邊境政治」的真正面貌。

舉例而言，個人在 2010 年 8 月前往泰國與柬埔寨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針對位於泰－柬邊境的伯威夏神廟遺址 (Khao Phra Viharn) 之爭端 (如圖一)，進行資料蒐集與專家學者訪談工作。此一神廟與周邊領土爭端持續已久，除了導致泰國與柬埔寨之間因領土糾紛所造成的緊張關係，更牽動到泰國國內的政治動盪。在筆者訪問曼谷期間，兩國媒體大幅報導雙方因為神廟衝突僵持不下而長期關閉邊境。相關訊息引起了個人的研究關注。首先，泰國與柬埔寨共享數百公里的邊界，兩國政府是否真的因為單一領土爭議逕自關閉所有的邊境孔道，確實啟人疑竇；其次，追溯印支半島的歷史，不難發現當前各國的政治邊界，多半由過去在地政權與外來殖民者所設定，介入並



圖一 瞭望伯威夏神廟（2012年，作者拍攝）



圖二 泰國駐軍解釋神廟衝突（2012年，作者拍攝）

割裂了地方上既有的族群關係與生活圈。由泰－柬衝突進而帶來邊境關閉的情勢，對於雙方邊區的跨境生命共同體而言，勢必是一大挑戰。

正因為以上研究關切，個人從 2010 年開始進行印支半島邊境的田野工作，從泰國東北的小村落 Krachangyai 開始作為理解泰－柬邊境政治的第一個據點，隨後逐步在東北區域走訪泰－柬邊界的數個邊區與檢查哨，以參與觀察與訪談的方式了解邊區情勢。從 2010 年迄今，筆者曾多次進出同一田野場域，不僅走過衝突的邊境，也造訪和諧的邊區。其中，亦不乏在田野工作期間面臨數個泰國軍方的檢查哨的盤查，同時也有幸受到泰國軍方的協助，至伯威夏神廟附近的軍區進行參與觀察（如圖二）。從近年的移地研究經驗



中，筆者發現在 2010 年衝突未歇期間，唯有伯威夏神廟附近的邊境遭泰、柬雙方政府關閉，其餘邊境檢查哨與關口（如 Chong Sangam、Chong Chom 與其他邊區）的既有邊境貿易流通與人員流動情況，均未受此一衝突所波及。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地方與地方之間盤根錯節的經濟網絡與族裔關係，甚至在部分邊區更出現由地方勢力介入，促成泰、柬兩國政府共同開發，建立市場、賭場、打造經濟特區的特殊合作個案。移地研究的經歷，駁斥了媒體與過去收錄資訊針對「泰－柬邊境全數關閉」的立場，也揭示了更多地方因素與地方利益所帶來的研究圖象。

在執行國科會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期間，筆者試圖針對泰國與周邊國家的邊境政治進行比較研究。在 2013 年至泰北進行泰－寮邊境政治的移地研究，發現泰－寮邊境政治的和諧發展展現出與泰－柬衝突個案截然不同的圖象。在泰北廊開府與寮國首都永珍所發展的跨境經濟合作關係，因為永珍座落在邊區而受到更多的重視。無論在永珍邊境檢查站前壅塞的車隊，或者是在澳洲政府於泰－寮之間所建築的友誼大橋上絡繹不絕的車流（如圖三），都說明了兩個邊區之間的密切往來與交流。更有甚者，兩國人民可以藉著連接邊區的友誼大橋橋側通道，直接通行無阻。

對於個人研究工作而言，如果沒有執行印支半島的多點式移地研究，如



圖三 泰－寮友誼大橋（2013 年，作者拍攝）



圖四 寮國永珍邊境檢查站（2013年，作者拍攝）

果沒有豐富的田野經驗的支持，筆者的邊境政治研究將只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受限於傳統國際關係國家中心論的假設與推論，以及特定新聞媒體的局限性報導與評論，因而無法深入、直接了解真實的「在地」，更遑論呈現箇中實況。過去幾年的移地研究工作，對於自我研究能量與研究視野的提升有三項重要的助益：其一，在研究設計上藉著移地研究的執行，筆者能實際參與邊境社會，藉著最直接的社會與人際互動，一方面了解國際衝突的在地實況，另一方面亦取得了第一手的在地知識與訊息。其二，從資料檢證的角度來看，移地研究不啻為一種將不同社會經驗與資訊共呈比對的參照過程。其三，對於東南亞邊境政治的研究主題而言，印支半島上的領土爭端與衝突，其實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問題，更牽涉到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係，這些在地性（locality）的重現，展釋出來自於地方的多元行為者之間的利害競合網絡。

過去幾年來，筆者從泰—柬神廟案所引起的邊境衝突逐步探索印支半島邊境政治與跨境生活圈的實際面貌。如果個人在一開始單從國際衝突與爭端研究的角度著手分析，很可能不自覺的被局限在國家主義的框架中，因而將忽略隱含在其中的歷史根源與在地流動性（local mobility）。事實上，這些被忽略的議題具備了豐富的區域研究旨趣，同時也是新生代區域研究學者需要挑戰與邁進的新領域。



四、結語：一旦走進田野，將更能看清世界

長年推動國內東南亞研究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蕭新煌所長，曾經提醒在臺灣進行東南亞研究的學者除了要以「為東南亞研究而研究東南亞」作為職志，更重要的是，東南亞研究社群必須將「到東南亞去研究東南亞」作為自我精進、自我鞭策的目標，才能在自我知識生產的過程中，成就質量俱佳的東南亞研究區域研究。²的確，作一個從事「區域研究」的新生代學術工作者，我們不能只重數據的詮釋、政策的設計、理論的辯論或時勢的討論，更應該務實的走出學術象牙塔內的文獻讀寫與詮釋場域，走進田野與世界。

在亞洲，新生代的區域研究學者正逐漸以深入探索、長期觀察、實際參與的方式，進行更多元、多層次的觀點交換，發展出一套研究在地區域的技藝，並試圖從中回應過去所習得的西方理論，運用更適切的研究方法，形構出一套「在地」觀點（在地世界觀）。拙見以為，藉助移地研究與跨域知識的多元汲取，藉著走進田野，才能走近研究對象，亦才能掌握研究對象、個案的特殊性與多元性，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更看清世界的脈動與細微的社會運作理路，更將有助於研究者本身知識建構過程的反身自省。

參考文獻

- 楊昊。2013。〈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技藝〉，載於楊昊、陳琮淵主編，《臺灣東南亞研究新論：圖象與路向》。臺北：洪葉文化，頁 47-63。
- 楊昊，蘇義淵。2013。〈政策社群的東南亞研究：以水資源安全為例〉，載於楊昊、陳琮淵主編，《臺灣東南亞研究新論：圖象與路向》。臺北：洪葉文化，頁 225-240。

² 蕭新煌教授於 2013 年 11 月 10 日出席《臺灣東南亞研究新論：圖象與路向》新書發表會中的引言。